

陳延傑先生經學論著三種

陳延傑 著
車行健 黃忠天 盧啓聰 整理

周易程傳參

詩序解

經學概論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陳延傑先生經學論著三種 / 陳延傑著 ; 車行健, 黃忠天, 盧啓聰整理.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21. 4
ISBN 978-7-5506-3379-7

I. ①陳… II. ①陳… ②車… ③黃… ④盧… III.
①經學—研究 IV. ①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20)第271389號

書名	陳延傑先生經學論著三種
著者	陳延傑 著 車行健 黃忠天 盧啓聰 整理
責任編輯	崔廣洲
裝幀設計	徐 慧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江蘇省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s.com
照排	南京凱建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 郵編:210038
開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張	12.625
字數	263千字
版次	2021年4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4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3379-7
定價	128.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68037411)



陳延傑先生

南雍學人陳延傑及其經學論著之整理*

車行健

一 緣起

兩江師範學堂出身的南京宿儒陳延傑(1888—1970)，在經學、詩學和古典詩歌創作上皆深有造詣，其於經學撰有《周易程傳參正》、《詩序解》、《經學概論》等書；於詩學除《詩品注》外，又有《孟東野詩注》、《張籍詩注》、《賈島詩注》、《陸放翁詩鈔注》和《文文山詩注》等多種唐宋詩人詩集箋注出版；於古典詩歌創作上亦結集有《晞陽詩》。其中《周易程傳參正》和《晞陽詩》皆曾於上世紀 40 年代獲得中華民

* 本文為“民國時期罕傳經學論著之整理與研究：以羅倬漢、陳延傑與蘇維嶽三家之著作爲中心(II)”(項目編號：“NSC 101-2410-H-004-109-”)之部分研究成果。研究此課題期間，獲得陳延傑之孫陳坤與江蘇省高級法院史筆法官的許多幫助，陳坤先生不但提供不少重要的文獻資料，且亦細心審閱文稿，提出寶貴建議。復得到南京大學和南京師範大學多位師友的支持與協助，前者有許結、徐興無、方文暉、劉重喜、張宗友等教授；後者則有孫原靖、趙生群、蘇芑等教授。此外，文哲所的林慶彰和蔣秋華兩位老師在研究方向和資料搜羅方面亦皆提供了許多實質的支援，謹志於此，用申謝悃。又，本人曾先後委請多位研究助理將陳延傑的幾部著作打字輸入電腦，亦一并申致謝忱於此。分工情況如下：《周易程傳參正》，由范雅琇與莊士傑打字輸入；《詩序解》，部分由倫凱琪與徐偉軒打字輸入；《經學概論》，由盧啓聰打字輸入並負責點校；《晞陽詩》，由李冀打字輸入、徐偉軒初步校對。

國教育部學術獎勵之肯定。陳延傑稱得上是一位學問優長、著作豐富的飽學碩儒，理應在當代中文學界有一定之地位。

然而，學界或稍知曉陳延傑在古典詩學和文學批評史上的表現，却對其經學研究不甚知悉，使其長期淪為林慶彰先生所謂的“被遺忘的經學家”^①，而其經學著作也因流通不廣，成為所謂的“罕傳經學論著”^②，令人悲嘆。但其經學撰述實亦有其獨到之成就與特色，不應將

① 參見林慶彰：《民國時期幾位被遺忘的經學家》，《政大中文學報》21期（2014年6月），頁15—36。林先生文中論及者共有徐天璋（1852—1936）、陳鼎忠（即陳天倪，1879—1968）、戴禮（1882—1935）、張壽林（1907—？）與李源澄（1909—1958）五位經學家，雖未叙及陳延傑，但林先生早在《陳延傑及其詩序解》（收入《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年）一文中，就已稱他“是個被遺忘的經學家和古典文學研究者”（頁426）。但陳氏的《詩品注》於古典文學批評界並不陌生，被遺忘的情況不若其經學論著徹底。然即便如此，陳延傑其人還是長期為人遺忘。上世紀80年代，在上海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曹旭，為調查《詩品》版本和文本問題，特意尋訪陳延傑，其自述經歷頗令人吃驚：“開始訪書訪學時，我毫無目標，手裏祇有一本陳延傑的《詩品注》。陳延傑是何許人？不知道。唯‘跋’後有‘江寧陳延傑’五字。江寧是地名，在今天的南京。南京，便成了我訪書的第一站。到了南京，問了許多人，都不知道《詩品》，更不知道陳延傑。後來請教南京大學教授程千帆先生，經程先生指點，尋訪南京文史館，終於在已經去世的館員名冊上查到了陳延傑的名字，然後根據地址找他的兒子陳鴻詢……”（曹旭：《詩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389）。

② 林慶彰和蔣秋華二教授於2007年1月起，開始在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推動“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的大型研究計畫（2007—2012）。吾人有幸參與此計畫，且在其中深受啟發與激勵，亦於2010年底向臺灣科學委員會申報“民國時期罕傳經學論著之整理與研究：以羅倬漢、陳延傑與蘇維嶽三家之著作為中心”的專題研究計畫，在計畫中提出整理民國時期“罕傳經學論著”的構想。與此同時，蔣秋華教授亦於文哲所中主持“罕傳本經典研讀”的讀書會。典籍的流傳與否有幸與不幸，不純關乎其自身之學術價值。民國肇建以來，雖然產生了大量的經學論著，然因時局不靖、社會騷動，無法提供學術發展和知識傳播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使得許多學人的重要論著在出版與傳播方面遭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寫成後始終未曾梓行者，亦有雖出刊却流通不廣者。在這種艱（轉下頁）

其輕易地從當代的學術記憶中抹滅忘却。吾人本於林慶彰先生所提倡“發潛德之幽光”的學術關懷，從現代經學發展的角度，來對陳延傑的生平經歷、著述撰作及學界的相關研究情況，做一基本之考察。一方面搜集整理其著述，以作為進一步深入研究之基礎；另一方面也藉此提醒學界之注意，使其學術之面貌和內涵能更多地為世人知悉，從而重新進入當代學術史的視域中。

二 陳延傑的生平經歷及詩文交游

關於陳延傑生平事迹的相關記敘并不多，最完整準確的當屬與陳延傑家族有累世交誼的史筆先生於1986年在《文教資料》(雙月刊)發表的《陳延傑生平述略》一文^①。文中對陳延傑的生平經歷提供了較完整的記敘，僅撮錄重點如下：

陳延傑，字仲英、仲子，筆名晞陽，江蘇南京人，生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八月二十二日。陳氏出身書香世家，幼承母教，黽勉向學。六歲入私塾，精熟《四書》、《五經》。十五歲從望江童觀學古文，旁攻

(接上頁)難的情況下，欲知曉其內容已實屬不易，更遑論評估其學術價值。可知，在大量罕傳經學論著被充分研讀與評價之前，學界對民國以來經學的認識與把握，可說仍是存在著許多的斷裂與空白。今日偶然發現其時之舊刊手稿，欣嘆之情，無異於看待新出土之古佚文獻，此罕傳經籍之可悲與可貴也。

① 2013年元月下旬，林慶彰先生為編輯《民國時期經學叢書》，在林師母和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林登昱董事長的陪同下，赴南京圖書館搜集資料。筆者與吳儀鳳教授當時為搜集陳延傑書稿資料，也一同隨行。在南京大學中文系許結教授的安排下，得見陳延傑孫子——已退休的建築師陳坤先生，和任職於江蘇省高級法院的史筆先生。從三人口中得知，許、陳、史三家原來是世交。據許結教授所述，他少年時與陳延傑是鄰居，常常在巷子裏看到他。而為陳延傑作傳的史筆先生，其叔祖史尚寬(1898—1970)更與許結父親許永璋(1915—2005)教授是莫逆之交。史尚寬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臺，歷任臺灣“總統府國策顧問”、“考選部部長”、司法主管部門第二屆大法官。許結在《詩囚》(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一書中，對史尚寬和許永璋的交誼關係，做了詳細的敘述，可參看(頁49—52)。

經義策論。十七歲舉秀才。次年，考入兩江師範學堂文科，從清道人李瑞清（梅庵，1867—1920）受小學及經學，專以治經為事。光緒三十四年（1908）畢業。先後執教於寧屬師範學堂、湖南高等師範、江蘇省立第四師範學堂、武昌大學^①、滁州第九中學、中央大學^②、金陵大學等校。

1949年後，陳延傑積極致力於南京的文物管理及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歷任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南京市政協一至五屆委員。其於1951年擔任南京市文管會圖書組組長，負責整理舊總統府遺留的圖書。晚年曾編輯南京文獻書目，共二百六十餘部，并撰成《南京文獻書目提要》（初稿）。60年代初，在進行《南京地方志經濟資料彙編》的工作中，不顧高齡，時常與會提出中肯意見。又曾在政協的會議上，針對中國古典文學遺產和南京古城牆的保護問題，多所建言。與陳方恪（1891—1966）等委員共同提出，要求保留中華門、石城、臺城、清涼門等古迹，受到許多有識之士的敬佩。然而“文化大革命”却為他本人及家人帶來了巨大的不幸，不僅大量藏書被抄，而且還被下放至江蘇省寶應縣。他最終於1970年8月24日，逝世於寶應縣汜水鎮朱橋村，享年八十二歲。^③

林慶彰先生於2001年發表的《陳延傑及其詩序解》中，《陳延傑

① 據1931年出版的《國立中央大學一覽·教職員錄》（收入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1084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所載，陳延傑在任教中央大學前，曾擔任“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國文系教授”（頁15）。案：武昌高等師範原名武昌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2月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更名為武昌高等師範大學，同年9月又改名為國立武昌大學。

② 據1930年出版的《國立中央大學一覽》中之《文學院概況》（收入《民國史料叢刊》1082冊），陳延傑在中央大學前身第四中山大學（1927—1928）階段時的中國文學系擔任助教，及至國立中央大學正式成立（1928年5月）之後，方升為講師（頁1—2）。

③ 史筆：《陳延傑生平述略》，《文教資料》，1986年第6期（總號168期），頁91—94。

的生平事略》一節，亦參考史筆此文撰成，並沒有多出史文的記敘^①。此外，吳新雷等編纂的《清暉山館友聲集：陳中凡友朋書札》、南京市白下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的《白下區志》、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的《南京社會科學志》和《南京人物志》等書中，亦有對陳氏生平的簡略介紹。然除《白下區志》和《南京人物志》外，餘二者皆寥寥不足百字，且皆未超出史文範圍。^② 本文擬通過三個方面的資料搜集與文獻的利用，來對史筆所述之內容，提供更多的補充，以期獲得對陳延傑較為全面與細緻的認識。

其一，為對其後人的訪談，可資了解陳延傑的家庭概況。根據陳延傑之孫陳坤先生的敘述，陳延傑共有三子一女，長子陳鴻瑞，畢業於中央大學地質系，擔任地質工程師，享年九十六歲。次子陳鴻祺，高中畢業時，正值日寇侵華，遂投筆從戎，報考海軍軍官學校，後隨國民政府去臺。在臺灣海軍服役時，曾被選送海軍指揮參謀大學深造，畢業後升海軍少將，任海軍艦隊參謀長及海軍造船廠廠長等職，享年一〇二歲。三子陳鴻詢及女兒陳芳，分別畢業於上海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和復旦大學經濟系，二人一生皆從事金融和會計工作，目前他們姐弟倆年事都近百歲，身體仍然硬朗。陳延傑有孫兒、孫女各七人，現均至古稀之年，分別定居在長沙、濟南、南京、廣州、深圳、臺北和高雄。孫輩及曾孫輩學業多為理工類，鮮有人從文、從政、從商。陳坤為陳鴻詢之子，而其二伯父陳鴻祺在臺灣亦育有二子二女，陳坤曾到

^① 林慶彰：《陳延傑及其詩序解》，《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頁411—414。

^② 吳新雷等編纂：《清暉山館友聲集：陳中凡友朋書札》，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743；南京市白下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白下區志》，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頁598—599；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京社會科學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頁1021；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京人物志》，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頁216—217。

臺灣探視過。^①

其二，爲其詩集《晞陽詩》紀錄了不少他的詩文交游關係，從中可以勾稽其生活、行事之面貌。其中多述其師友關係，如述其本師李瑞清者計有《臨川李文潔公挽詩》、《過胡三自怡齋觀李文潔公書畫》、《庚申冬月廿九日會葬李文潔公牛首山》、《牛首山謁李文潔公墓》、《携家牛首山春望還謁李文潔公祠》等五首。^② 述其詩學淵源所自的陳三立(1853—1937)之詩，有《同翔冬小石謁散原老人別墅還啜茗溪上》、《寄散原老人廬山》、《陳散原先生八十生日》、《散原先生挽詩》等四詩。又有叙其從游於柳詒徵(翼謀，1880—1956)者，共十三首，數量最多，其中尤可略見陳氏與柳氏主持之國學圖書館交涉利用之情況，如《謁翼謀先生圖書館出示劬堂詩錄因獲拜誦歸輒題之》、《十二月廿二日雪初晴謁翼謀先生蓋山圖書館邀觀善本書錄其所見》、《謁翼謀先生蓋山圖書館遂同登掃葉樓》、《正月初八日與陳秋帆錢茂萱謁翼謀先生蓋山圖書館還登清涼山》、《夏日訪翼謀先生蓋山圖書館不遇還尋烏龍潭清涼山諸勝》、《謁翼謀先生蓋山圖書館出示近和人排律之作蓋寄憤也感賦長句》。

同輩友朋中，酬酢最頻繁者，當屬胡翔冬(1884—1940)和胡小石(1888—1962)，二人合詠者(包含其他人)有《同翔冬小石謁散原老人別墅還啜茗溪上》、《月夜齋中孤坐寄二胡》、《游古林寺同翔冬小石旭君作》、《月夜步溪上憶二胡》諸詩。亦有獨詠其中一人者，如《中秋夕復成橋玩月憶翔冬牛首》、《講經坡宴集送小石之武昌》等詩。此外，其詩作中涉及之當代學林人物，亦復不少，較知名者有：王伯沆(1871—1944)、章士釗(1881—1973)、黃侃(1886—1935)、汪辟疆(1887—1966)、尹石公(炎武，1888—1971)、陳中凡(1888—1982)、汪

① 此段文字係綜合陳坤先生在微信上對筆者的敘述內容，及幾次的口頭訪談而成。

② 《晞陽詩》，家藏抄本，下文所引皆同此，不復出注。

旭初(1890—1963)、陳寅恪(1890—1969)、黃懋華(1890—1977)、蔡嵩雲(1891—1944)、湯用彤(1893—1964)、彭醇士(1896—1976)、馬宗霍(1897—1976)、柴曉蓮(1898—1974)、羅倬漢(1898—1985)、陳立夫(1900—2001)、盛紫莊(1901—1968)、梁實秋(1903—1987)、李清悚(1903—1990)、盧冀野(1905—1951)、李辰冬(1907—1983)等人。

師友交游外，《晞陽詩》中亦反映了不少他的生平經歷，如《甲子十月十三日自滁州避亂，乘土車行三十五里，是夕宿水口，翌日早發，行七十里，抵浦口，晚過江還家，作一首》、《乙丑九月十八夜發板浦避兵，廿四日抵鹽城，越二日乘舟還金陵，中遭風覆舟，幾沉溺，畫然賦此》、《丁丑十月都中淪陷，遂携家逃往六合，未幾六合又失，倉皇播遷，始以戊寅正月廿五日抵興化，遇柳翼謀先生於塗，悲歡不已，相偕入茶肆茗談》、《丙戌三月自成都携家還都，車赴重慶，黃福聯福陞昆仲、王理明、熊漢章、蕭定梁諸生及兒子鴻詢送至牛市口》等，這些詩皆記錄了他所經歷的戰亂流離生涯，前二詩寫作年代為1924、1925年，講述的是軍閥混戰下避難的遭遇；後二詩則是述說對日抗戰爆發，南京淪陷，舉家西遷，以及抗戰勝利，携家還都的過程。又《夜雨》一首，陳延傑於“圖書萬卷厄胡兵，草堂毀去無題寄”句下自注云：“余築宅通德里，都中淪陷，宅為倭寇所破，家藏萬卷盡厄於兵火。”家破書毀，誠令人傷心悲憤矣！詩人在對個人小時代的歌吟中，折射了其所生存的大時代；而大時代的刀光劍影，杌隉艱屯，也縮影於詩人所吟嘆的小時代中。

《晞陽詩》所收詩作止於1948年《丁亥除夕作》，陳氏時年六十歲。從中可大體略觀其六十歲前的生活、經歷與交游之狀況，史筆稱其詩作係其“生活和思想的紀錄”^①，洵然也。

其三，為當時的各種文字記載有涉及陳延傑生平經歷者。其中

① 史筆：《陳延傑生平述略》，頁93。

最直接相關的，就是時人與他的詩歌酬酢，如其摯友胡翔冬所作之《自怡齋詩》中，即收有多首和陳延傑的酬唱詩作，《過香林寺同胡小石陳仲英作》、《同杜岷原錢茂萱陳仲英兒子家義家良游攝山并寄小石》、《泛舟玄武湖同胡小石陳仲英作》等皆為述及陳延傑之紀游詩作^①，可和《晞陽詩》中與胡翔冬相關篇什合而觀之，當可對二人交誼有更親切之了解。^② 又如胡小石亦有《清涼寺同胡三陳仲子作》、《詠陳仲子》及《己未初夏游北湖同胡三陳仲子流連昔游愴然有作》等詩，刊載於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國學叢刊》1卷1期中之胡氏《夏廬詩鈔》，見證了陳延傑與胡小石、胡翔冬三人的早年情誼。^③

此外，陳延傑與時人交游的“詩文足迹”也在當代學人的載記中留下了記錄，如比陳延傑大兩歲，且皆曾在武昌高等師範任教過的黃侃，即曾在他的日記中寫到他應陳延傑宴飲之邀的過程：

① 胡翔冬：《自怡齋詩》，頁2下、頁8下—9上、頁9上，己卯仲夏金陵大學文學院刊。與陳延傑有關詩作尚有《同小石仲英泛舟青溪溯流至西方寺側納涼》（頁12）、《講經坡觀群兒放風箏同仲英作》（頁15下—16上）與《七月晦日牛首山房坐雨戲成小詩寄仲英》（頁16下）。

② 然據程千帆（1913—2000）的回憶，二人的交誼後來似未能持續下去，其中的關鍵竟然是因“兩個人論詩的意見不合，就不好了”。程氏感嘆道：“老輩做人真是認真，論詩不合也會影響交情。所以，翔冬先生詩裏寫過：‘交窮詩是鬼，肥勝酒為兵。’”（程千帆述，程章燦記：《閑堂師語》，見《桑榆憶往》，收入《程千帆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卷，頁139。）

③ 《國學叢刊》，1卷1期，頁131—132，1923年。案：此三詩亦收錄於吳徵鑄（白甸，1906—1992）所輯《願夏廬詩詞補鈔》，見《胡小石論文集編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319—320。另在吳徵鑄所輯《願夏廬詩鈔》中，亦錄有《十月二十七日翔冬招同仲子茂宣游毛公渡荻花甚美》、《十桂堂晚望同仲蘇仲英作》、《與二仲游龍華寺并寄翔冬滁州》、《同胡三陳仲子束天民游劉氏廢園作并調胡三》與《白華邀同仲子確杲諸公聽董蓮枝詞，喜衡如新自成都至》等數首與陳延傑有關的詩作，見《胡小石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227、230、236、255。然《國學叢刊》1卷1期所載之《辛酉仲春陶然亭登眺有懷江寧舊游并寄滙翁仲子》却未見輯於《願夏廬詩鈔》和《願夏廬詩詞補鈔》（頁130）。

午偕旭初赴陳仲子(仲子昨親來肅賓,甚敬)之招,飲於老萬全,坐有翊謀、伯弢、湯用彤。翊謀示以在焦山抄得康有為題別峰庵藏德宗龍袍詩。用彤言蒙文通思晤予,彼將延予素食,為之介紹,且邀歐陽竟無居士。^①

黃侃記此日記的時間為“己巳十月廿四日癸酉”,即陽曆 1929 年 11 月 24 日周日。案:《唏陽詩》中共有二首詩的詩題提及黃侃,通過與黃侃日記的對勘,可對詩歌寫作背景有更清楚的理解,如《己巳秋七月六日,同王伯沆、黃季剛、汪旭初及潘、黃二君車赴鎮江,晚泛舟至焦山,月落天黑,草木深鬱,兩三僧舍或鐙火隱顯,而江濤悲壯,無可投止。會翼謀先生亦在山,偶逢于松寥閣,因得以飽啖山蔬。坐閣上,天風振衣,信可清暑,更留宿定慧寺,翌晨遂偕游焉》,關於此詩中所述之焦山之游,黃侃在日記中有較詳細記載,其於同年 7 月 5 日丙戌(陽曆 8 月 9 日周五)記道:

晴熱。晨起往閱試卷,邀伯沆、仲子、旭初來寓午飯。^②

6 日丁亥復記:

晴,彌熱。晨復往閱卷,三人者仍來午飯,飯後忽發興游焦山,遂以四時行,六時到京口。覓得紅船渡江時,風雲忽惡,逆風作之字形,三折乃至焦山,已暝。至文殊閣門前,適遇柳詒徵,邀予等至松寥閣憩,晤陳佩忍。飯後宿定慧寺之伊樓。夜雨。^③

7 日戊子又記道:

① 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中冊,頁 599。

②③ 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中冊,頁 563。

晨大雨，旋止。粥後遂登山至別峰庵，索觀康有為自述戊戌變政卷子，僧不肯出，乃求紙書一絕而去。匆匆周歷全山，還飯松寥閣，至文殊閣午眠。四時許匆匆歸，此游不暢。八時抵下關，飯於萬國春，初食芒果、杯子冰忌廉，甚美，乘汽車返。^①

黃侃日記將出游動機和經過交代甚詳細，而陳詩的詩題及詩句則對景物和其心境有所鋪陳。讓黃侃深感“不暢”的此次出游，却因泛舟江上的情境而讓陳延傑興發出“紛吾飢所驅，飄梗悲禾黍”的感慨，且除此詩外，又接連作了《宿焦山定慧寺》、《翼謀先生飲集同人于松寥閣看雨》、《焦山歸來閣謁端忠敏公銅像》等三首詩。^②

黃侃之外，當時同在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吳梅（1884—1939）也在日記中留下了與陳延傑有關的事跡，除一般的酬酢宴飲外^③，亦有關於陳延傑為中央大學解聘及托吳梅致書蔡元培（1868—1940）謀事的記載。據《南京大學文學院百年史稿》所載，陳延傑於1927年在中央大學前身第四中山大學中文系開始擔任助教職務，1928年升為講師，直至1936年7月，因中文系裁員，不再延聘。^④期間曾教授“唐詩”“宋詩”“毛詩”等課程。^⑤吳梅在1936年陰曆5月22日（陽曆7月10日）的日記中對解聘一事有較詳細的記載：

① 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中冊，頁563—564。

② 黃侃於是年8月18日（陽曆9月20日周五）日記中記道：“陳延傑示以游焦山三詩，當作書贊之。”（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中冊，頁576。）

③ 如1933年10月29日（陽曆12月16日）及1934年4月30日（陽曆6月11日）所記皆是與宴飲、喜慶有關的活動，且陳延傑皆非活動主要的人物，前者宴飲的主客是汪旭初，後者則同為參加殷孟倫（1908—1988）的婚禮，他與陳延傑皆去贈送賀禮。前者見王衛民編校：《吳梅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日記卷上，頁375；後者見頁427。

④ 南京大學文學院編：《南京大學文學院百年史稿》，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58、60—61、63、71。

⑤ 南京大學文學院編：《南京大學文學院百年史稿》，頁65—66。

往訪旭初，為言校中事，社會學系則停止，國文系則裁人，林公鐸既自行辭職，伍叔儻、陳仲子又不再延聘。蓋教育部令以文學院生僅八十名弱，而所開課程竟八十餘種，幾一人一課矣，非裁減不可。旭初於是將叔儻辭去，以叔儻為部中參事也。仲子以教法不佳，連類推及，而疊作兩函，痛詈旭初，未免胸襟窄小，且要求貼俸二月，又不當作漫罵語也。^①

其於8月4日(陽曆9月19日)的日記中復記道：

歸寓則李厥安在坐，談諧頗適。而彭生(鐸)、楊生(志溥)至，言次深以校中辭去陳仲子為非，且言仲子雖無大好，然尚勤懇，家累頗重，可念也。余亦未便多言，坐良久去。^②

關於陳延傑的去職，史筆認為是因其個性“正直、謙虛，為世俗卑媚者不容”，遂“被排擠出中央大學”^③，但若綜合校系史及吳梅日記來看，似乎除了個性、人際關係之外，也還存在著客觀政策與制度方面的問題。

其實，陳延傑在中大教職的不穩定，早就反映在數月前的吳梅日記中，1936年陰曆2月23、24(陽曆3月16、17)兩日的日記中，吳梅分別記下了“陳仲子來，托余致書蔡子民，為覓一枝托，允之”，及“為陳仲子作書蔡子民，托其謀事，未必有效也”。^④從事後的結果來看，

① 王衛民編校：《吳梅全集》，日記卷下，頁746。

② 王衛民編校：《吳梅全集》，日記卷下，頁781。

③ 史筆：《陳延傑生平述略》，頁92。陳坤先生從家屬的立場看待這個問題，也有類似的認識。

④ 王衛民編校：《吳梅全集》，日記卷下，頁690。案：今翻檢蔡元培日記、書信，渾不見吳梅致書迹影。在充斥著學界、政界大人物及社會名流的蔡元培日記和書信中，即使吳梅的名字廁身其間，都尚覺不起眼，更何況是像陳延傑這樣一位不怎麼合時宜的學界邊緣人物？悲夫！

確實無效。《秋夕貧居書懷》一詩或是他當時心境的寫照：

桐月纖暉飛透戶，淒然秋入鬢毛衰。老蟲鳴砌方憂亂，孤榻
搖鐙自寫悲。游宴東山尋謝趣，簞瓢陋巷忍顏飢。恢恢四海獨
貧我，天地豈無覆載私？

據程千帆的回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教授的待遇很優沃，中大教授每個月三百塊大洋，金大教授也有一百八到二百元。^①失去中央大學這筆穩定的收入，勢必會影響到陳延傑的生計。但他并未因此消沉，反而更加發憤研究學問，閉戶著書，完成了多部唐宋詩人詩集箋注。^②而他在抗戰時期避難大後方，亦有機會擔任內遷至四川成都的金陵大學中文系教師^③，並且還積極地參與教育部舉辦的學術與文學著作獎勵活動，這些都可從其詩作和論著中得到印證，顯見他并未與整個學界和文壇脫節。

三 陳延傑的學問和著述

陳延傑既是學者，又是詩人。在詩歌創作方面，他早年從陳散原學詩，於古典詩寫作上深有造詣，《晞陽詩》是他的代表作，收錄 293 題共 324 首詩。^④史筆對其詩歌創作有如下的評語：

先生詩法江西，而有所變化，於瘦硬中蘊含柔媚，或抒情，或

① 程千帆述，程章燦記：《閑堂師語》，見《桑榆憶往》，收入《程千帆全集》，第 15 卷，頁 137。案：在中大地位不高的陳延傑或許領不到教授三百塊大洋的俸祿，但即使打些折扣，收入依然可觀。

② 史筆：《陳延傑生平述略》，頁 92。

③ 南京大學文學院編：《南京大學文學院百年史稿》，頁 14、78、84。

④ 《晞陽詩》中共有七組詩是以同題多首的組詩形式創作的，純就詩題來看的話，可說有 293 篇詩；但就詩的實際數量來計算的話，則共有 324 首詩。

叙事，藝術地再現了先生的抱負與心志。^①

從《晞陽詩》獲得 1944 年度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著作獎勵“文學類”三等獎一事來看，其詩藝確實得到文壇學界相當程度的肯定。雖然如此，《晞陽詩》却從未正式出版，只以抄本的形式留存於其家。此詩集雖曾於 1944 年結集參審過，然陳氏家傳抄本却收錄多首戰後還都時期之作，詩集最後一首詩為作於民國三十七年的《丁亥除夕作》^②，可知家傳抄本《晞陽詩》結集時間當為 1948 年後。^③

而在學者的學術研究方面，他經營的領域主要集中在經學和古典詩學方面。就後者而言，他曾對唐宋著名詩人的詩集做過箋注，包括《孟東野詩注》、《張籍詩注》、《賈島詩注》、《陸放翁詩鈔注》及《文文山詩注》；亦曾對古典詩學的一些重要問題做過專門研究，而有《蘇李詩考證》、《漢代婦人詩辨偽》和《魏晉詩研究》等單篇論文之發表。但讓他在當代中文學界還不至於完全被遺忘的學術成果，却是他對《詩品》的研究，而《詩品注》一書也是他所有的著作中知名度最高的。關於陳延傑在當代《詩品》研究上的地位，程國賦曾做出如此的評判：

據筆者所知，最早的專著是陳延傑的《詩品注》，1925 年撰成，1927 年由上海開明書局出版。……最早的一篇論文是陳延傑的《讀〈詩品〉》，刊於《東方雜誌》23 卷 23 期（1926 年）。在本世紀的《詩品》研究史上，陳延傑具有筭路藍縷之功，占有突出的地位。^④

① 史筆：《陳延傑生平述略》，頁 93。

② 丁亥年陽曆雖為 1947 年，但該年農曆除夕却為 1948 年 2 月 9 日。

③ 案：《晞陽詩》雖為陳延傑詩作結集，然并非他詩作的完整收錄。他在 1949 年前，曾在多種報刊上發表他的詩作，現今可尋覓者，就至少有 20 首未見於《晞陽詩》集中，詳參文後“附錄：陳延傑著作目錄”。

④ 程國賦：《鍾嶸詩品研究 70 年》，《許昌師專學報》，第 19 卷第 6 期，2000 年，頁 26。

陳延傑這本注本雖是民國以來最早的《詩品》注釋本，但也因為處於草創階段^①，其中內容不免有疏誤，引發當時學界的訾議。^② 然而誠如《詩品》研究專家曹旭教授對此書的評價：

作為民國以來第一本《詩品注》，總有首開風氣的作用。並且，也還有它的特色。尤其不可忽視的是，陳注是所有《詩品》注釋本中發行量最大、市場占有率最高，也是最通行的注本。^③

總括來說，“最早”和“最通行”這兩點應該就是陳延傑《詩品注》的主要特色。

再就經學而言，他下的工夫并不比詩學來得少，他在這方面的撰述，可見者計有《經學概論》、《周易程傳參正》、《詩序解》、《詩經集解》等四種，又有《詩經類編》、《春秋類編》等二種未刊著作，為史筆文中所提及者。其中僅《經學概論》、《詩序解》二書曾於上世紀 30 年代刊

① 高明(仲華, 1909—1992)曾謂：“曩識陳君仲子，獲讀其《詩品注》，雖多其初闢榛莽，而恨其未能精至。”見氏撰：《詩品論疏序》，《高明文輯》，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下冊，頁209。

② 曹旭：《詩品研究》，頁237—238。陳注疏誤及為時人訾議的相關敘述，俱見該書頁235—242。相關評論另見周振甫(1911—2000)：《詩品譯注·前言》，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2。

③ 曹旭：《詩品研究》，頁237—238。然而發行量究竟有多大呢？僅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的修訂版而言，據王發國、陳曉超的估計：“人民文學出版社於當年八月又在上海第2次印行了此書，印數多至一萬冊。若加上北京的三千冊，於是，新版《詩品注》便成為‘所有《詩品》注釋本中發行量最大、市場占有率最高，也是最通行的注本’（曹旭《詩品研究》語）。這還不包括‘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各次再印刷的數量以及1998年二月印行的五千冊之數。”（見氏撰：《鍾嶸〈詩品〉應當重新作注（上）——兼論陳延傑〈詩品注〉》，《許昌師專學報》，第20卷第1期，2001年，頁35。）若再加上海外的翻印，則數量當更可觀。